

November 2013

Power, Representation and the Advoca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 Study on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Qinghua C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ao, Qinghua. 2013. "Power, Representation and the Advoca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 Study on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6): pp.50-5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6/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力、表达与新文学的倡导

——兼论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

曹清华

摘要:五四知识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之下,倡导的是一场“表达的革命”,而居其首者乃表达工具与表达方式的变革。他们在“新文学”的“内容”方面的话语建构,则是对表达的对象、表达者的位置以及表达与表达对象之关系的规范和描述。他们的基本的关怀均在于如何令“表达”更加有力。所谓的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事实上是“全盘性反表达”——反对包括“见容于社会”的表达,通过权力网络保存和传播的表达以及权力者的表达。而对弱者的表达、不为权力网络所保存和传播的表达、不被人注意的表达却做了整理和研究工作。

关键词:力 表达 新文学 五四 反传统

作者简介:曹清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qinghuacao@hotmail.com 本文写作得到广东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09J-06]的资助。

Title: Power, Representation and the Advoca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 Study on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Abstract: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slogan of “Literature Revolu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lls actually for a revolution of representation, and at the foremost of the revolution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ans and manner of representatio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nt of “new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disciplin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represented objects, the posit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presented objects, but the essential concern is on how to empower the representation. The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n then be understood as the totalistic anti-representation which opposes the representations acknowledged by the society, preserved and communicated by the power network, and effectuated by the powerful.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owerless, of those ignored by the power network, and of those neglected by the society are researched and preserved by th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power representation new literature the May Fourth Era anti-tradition

Author: Cao Qinghua is a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qinghuacao@hotmail.com

近一百年来,讨论新文化运动或者文学革命的历史,从“五四”当事人到后来的研究者,他们常常把这两者连结在一起加以叙述。要么以思想与文艺并举;要么认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视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①两者之深层的意义关联,至今没有获得研究界足够的重视。在事实上,我们可以勾勒出陈独秀、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走上“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条十分相似的人生路径。正是在这途中,他们注意到了文学,继而对话言改革发生了兴趣。现在的

问题是,这样一条“文化——文学——语言”的演变线索背后,其推动力源自何处?它们在功能上有什么相通的地方?本文从探讨这几个问题入手,从“力”与“表达”的角度重新阐述新文学倡导以及所谓的五四“全盘性反传统”的历史文化功能。

一、表达与“力”

梁启超1902年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所写的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②专门分析了小说的“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在梁的论述中,这种“力”的产生并不限于小说,而是扩展到了“文学”,乃至“表达”(representation)本身。梁在比较“熏、浸、刺、提”四种力时,特别分析“刺”亦即“刺激力”与表达工具(means)及表达方式(manner)的关系:

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8)

在梁启超的评判系统中,小说能够从众多符号表达(语言/文字等等),特别是文学表达种类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根本的原因在于小说以“俗语”为表达工具,以“寓言”为表达方式,因此而拥有最大的“力”。

梁启超还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小说”与他期望中的作为接受者的“一国之民”的关系:“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8-9)。尽管这个比喻本身暗示了“表达的制造者”——“表达”——“表达的接受者”之间相互牵扯的关系,以及表达的力的传递的网状路径,作者却只论及小说之“力”对接受者的单向的作用,所谓“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8),等等。以致梁启超认为,一方面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另一方面,“欲改良群治”、“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作为表达,其力量被渲染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

也就在梁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数年内,陈独秀、鲁迅、胡适先后以担任编辑或筹办报刊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思想文化”活动,^③实现了从单一的表达接受者到表达的制造者、传递者的转换。与梁启超一样,他们不仅深信“表达”的唤醒与改变的力量;而且致力于探讨与实践如何令“表达”的力量更加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胡适 1908 年在上海编辑白话的《竞业旬报》。在第 29 期中,他以编者的口吻刊出了一篇《本报之大纪念》的文章,提出了与梁启超同样的“新民”主张:“第一,要希望列位能够实行本报的话[……]第二,要希望列位看官帮助我们这个报,达我们的目的[……]多开几个演说会,把我们报里的道理,时时演说一番”(“本报”74-75)。陈独秀早在 1904 年便以类似的言辞在《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上阐明这份报纸的两个“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讲演出来”(“开办”3)。这一年他还在《安徽俗话报》发表了《国语教育》、《说国家》、《论戏曲》等探讨“表达”的论文。其中《论戏曲》结尾一段的说法最为形象:“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论戏曲”6)。而鲁迅则因为 1906 年间萌生的“改变他们的精神”(416-17)的理想当年走上办刊与写作的道路。

陈、胡、鲁这种种对自己从事的思想文化活动本身的描述,不仅展示了他们对于表达的力量的信心,也透露出他们对于表达行为的基本态度与期望。首先,他们想象中的“读者”/“表达的接受者”并非千差万别的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经过精心修饰面目趋同的群体。“四万万同胞”、“安徽人”、“中国人”的说法来自族群的划分;“新鲜活泼之青年”一类的描述则出自对历史的想象。这一相近的对于表达的接受者的想象和设计,暗示了五四知识者对于悬空的表达者的位置以及单向的表达传递通道的向往。

其次,他们寄希望于表达工具、方式和媒介的变革,以令表达的力量更加迅速及有效。陈、胡早在白话文运动的十几年前便加入潮流,实践通俗易懂的“俗话”/“白话”的语言工具,并倡导“讲演”、“演说”的表达方式。与梁启超 1902 年在《新小说》连载《新中国未来记》(仅四回未完)惊人地相似,陈独秀 1904 年在《安徽俗话报》,胡适 1906 年在《竞业旬报》,亦分别连载了未完成的章回体白话小说《黑天国》与《真如岛》,以表达其政治与文化意见。与此同时,他们均以兼任编辑与主笔的身份踏入思想文化领域。月刊、旬刊以至

周刊的连续出版物的传播媒介,既让他们躬身体会到表达从制造者到达接受者手中的迅速,也让他们对便捷的表达流通渠道充满了期待。^④

二、表达与“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作序时说,“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9)。蔡元培的这个论断,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五四知识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之下,倡导的是一场“表达的革命”,而居其首者乃表达工具与表达方式的变革。其宗旨亦在于如何令表达更加有“力”。

1914年,经过10年政治实践的磨练,陈独秀重返编辑写作事业,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一反十年前的乐观心态,这篇文章充溢着愤激绝望的情绪。然而,其基本的关怀一如既往地集中于“国民”与“国民之智力”——所谓“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陈独秀,“爱国心”5)。一年后,同一家刊物上发表的黄远庸的通信便有“提倡新文学”一说:

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2)

这里的“提倡新文学”,显然着眼于文学作为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的“促其猛省”的唤醒和改变功能。这篇通信在《甲寅》杂志发表的几天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的头题刊出《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多少有些呼应的意味。陈所讨论的“广义的教育”囊括了“伟大哲匠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等几乎所有的“表达”类别。而陈独秀提倡的四项教育方针中,“现实主义”居其首

位。陈独秀强调,除伦理、政治等实践行动应遵守现实主义之外,“文学、美术”等表达行为亦应该追求“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以实现“讽劝其国人”的目的(“今日”1-4)。

在接下来的《青年杂志》第3、4号上,陈独秀又连载《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其上篇勾勒了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的路径,阐述最新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基本要义。下篇则专门讨论了文学的功用——“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陈独秀,“现代欧洲”1)。在第4号回答读者张永言的来信时,陈独秀进而描绘中国文学发展的前景,声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两相对照,两本刊物看取“文学变迁”的眼光,显然在于文学作为“表达”,其“促其猛省”、“左右一世”的力量。

这篇论文及引发的相关讨论当时便引起了胡适的关注。尽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称,是一连串的小意外事件把他“逼上梁山”,迫使他违反“本意”而选择对中国语文作激进改革的道路。而事实上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提到的第一人是钟文鳌。钟文鳌的“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的小传单,促成他写下《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论文。文中所列的首要问题是“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可见,与陈独秀相若,胡适同样因为“教育”/“表达”的难题而关注文学。而语言作为表达的基本工具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用,事实上贯穿了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系列论述。

胡适因应陈独秀有关“文学变迁”的讨论,最初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消极的“八事”,后来便被概括为积极地探讨如何“表达”/“说话”的“四条”;^⑤让胡适日后颇为得意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更是阐明了国语作为表达工具的正宗地位的确立,为其倡导文学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概括其白话诗实验中白话的特点时,胡适强调的亦是白话在表达功能方面的优势: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

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

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论小说”77)

正是如此，陈、胡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作为一般表达方式的“应用文”文体。^⑥“应用文”的改革亦成为后来“文学革命”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钱玄同在第3卷第5号的《通信》里头，迫不及待地刊出他计划中要撰写的《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的“十三事”的梗概，事实上就是对胡适的“八事”的进一步阐发与补充，也是《新青年》日后讨论和实践“句读符号”、“数目字”、“纪年”、“左行横式”、“汉字索引”、“西文译名”、“减省笔画”等诸项改革的一个总目录。1918年1月的第4卷第1号刘半农发表的《应用文之教授》，批评旧的文学教育只是教学生做“滥调文章”，强调现在应该以“记事明畅，说理透彻”的应用文为教学目的。第4卷第4号上，林语堂撰文指出，“文学革命至高最后的目的”，必定是西人的“有名的讲学说理之文”——“用字的适当，段落的妥密，逐层进论的有序，分辨意义的精细，正面反面的兼顾，引事证实的细慎”，白话文学应该“设一个像西方论理细慎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⑦

这样就不难理解，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傅斯年等人自始至终对语言改革的兴趣，以及他们激进的文字改革意见了。钱玄同、吴稚晖等人倡导在过渡时期选一门外语为第二国语，希望于未来彻底废除汉字与汉语，使用一门类似“世界语”的通用语，其最后的推动力在于，他们认为只有改变语言才可能让“表达”发生真正的根本性的变革。^⑧

三、表达与“新文学的内容”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里面说，“但当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我们实在不配谈文学内容的革新，因为文学内容是不能悬空谈的，悬空谈了也决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导言”28）。这篇导言胡适用了27页的篇幅

阐述“活的文学”的理论的来龙去脉，而讨论他所谓的内容上的“人的文学”的部分仅占了3页。

在事实上，尽管“文学革命”的讨论被引入，以致被大多的读者与讨论者当作工具革新与语言变革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学”在“内容”方面的话语建构，亦即上述胡适所说的“悬空谈”，仍旧是这场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前者聚焦于表达工具、表达方式的变革；后者则对表达的对象（represented object）、表达者的位置以及表达与表达对象之关系进行了种种规范和描述。其基本的关怀仍旧在于如何令“表达”更加有力，发生更“有力的影响”。

一方面，他们倡导“现实生活”为新文学的再现与表达对象。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描述，成为五四“新文学”倡导者规范表达行为的重要手段。

在时间上，作为表达对象的“现实生活”应该是“今日的”，“现在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傅斯年在谈戏剧改良时直截了当地说，“剧本的材料，应当在现在社会里取出，断断不可再做历史剧”（“再论”359）。而在空间上，“现实生活”应该切合人事，包括全社会的情形。胡适谈“创造新文学”的方法，便提倡“推广材料的区域”——“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个位置”（胡适，“建设”301）。傅斯年则认为中国文学最大的病根在于“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所以，“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中国”346）。这一对“现实生活”的时空范围的界定，其目的无疑在于，让表达行为在表达的制造者与接受者之间，建立一种尽可能直接的意义联系。

而且，他们视“现实生活”为“人生的真相”的展示，期待其作为表达对象，承载和传递尖锐而具有针对性的意义。陈独秀在早期《新青年》第1卷第6号提倡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时，把“现实生活”视为“真相”的化身——“自然主义尤趋现实，[……]虽极淫鄙，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通信”1-2）。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面亦强调，“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490）。更重要的是，五四知识者眼中的“人生的

真相”与实证科学同步,与宇宙社会的“真相”、“真理”贯通。尚未发起文学革命讨论之前,陈独秀便指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通信”1;第1卷第6号)。在《文学革命论》里头,他又批判作为“新文学”的革命对象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三者,“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3-4)。

此外,他们还倡导一个中立的“表达者”的位置,认为如科学实证一般,“真理”、“真相”来自“现实生活”本身而不是其他,表达者应当承担一种类似于镜子的功能,以避免造成对“现实生活”承载与传递意义的干扰。陈独秀反对理想主义而提倡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与不认可胡适的“言之有物”一说,皆基于这一思路,所谓“实写社会即近代文学家之大理想大本领。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通信”12;第2卷第6号)。钱玄同阐述“外国小说家”的长处时也有类似的想法——“拿很透辟的眼光去观察现在社会,用小说笔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总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通信”9-10;第3卷第6号)。

另一方面,不无矛盾的是,他们又倡导“思想”与“情感”为新文学的再现与表达对象。尽管陈独秀在回复胡适最初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的来信时,已经阐述了他反对“言之有物”的意见,认为“言之有物”的流弊将与“文以载道”相同。胡适在之后应陈独秀之约,所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仍以“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来解释“言之有物”的具体所指。胡适这一意见甫一发表,便获得了不少读者的支持。曾毅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文以载道之道,即理,即今之所谓思想”,只是要加上一个“正当的”条件以限制而已(6)。余元浚则认为“文以载道”的“道”字,应该在胡适所说的“物”字之中——“道之云者,直一种上乘之思想已耳”(4)。在这之后数年的讨论中仍有不少类似的意见。诸如钱玄同评价近代小说——“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通信”5;第3卷第1号)。傅斯年要求新剧本“务必使得看的人觉得戏里的动作言语以外,有一番真切道理做个主宰”(“再论”360)。罗家伦把“最好的思想”列

作“文学”的基本条件(109),等等。

这两方面的主张看上去自相矛盾,却又常常出现在同一讨论者的笔下。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均催生于五四知识者规训文学作为一种“表达”行为的强烈愿望——亦即如何使得表达所产生的意义,在表达的制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直接而又有效地传递,以致“表达”更有“力”。在事实上,于前者,“现实生活”是表达的产物,而并非表达的对象与依据。表达者所据以的表达系统、表达的传播途径、表达的接受者等因素,均制约着“现实生活”与“人生真相”的建构。傅斯年宣称旧社会“没有生活可言”(“戏剧”330),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罗家伦甚至呼吁政府查禁他所谓的“黑幕派”及“滥调四六派”小说(107-08)。于后者,对“思想”的推崇与界定,也就是对于表达者所据以写作的表达系统的直接的规训;同时亦为表达者与表达的接受者之间的交流通道,设置了某种想象的单向关系。他们均忽视了文学作为一种以叙事语言为手段的表达方式,其创造多元的相互作用的表达网络,挑战和突破一切既定的表达系统的功能。

历史的难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初步的成效之时,周作人在新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思想革命》一文,声称“文学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文字改革,第二步是思想改革。而这第二步改革的目标,是令中国人“洗人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否则“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作‘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周作人3)。现在的问题是,既然盘踞于表达者意识深处的表达系统可以摆脱语言而存在,那么,某一“新”的知识/表达系统又如何能够通过作为语言表达的文学而发生作用?

两个月后,傅斯年发表《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响应周作人的《思想革命》。傅氏认为,文学革命单说“思想革命”还不够,其中还应当包括“感情的发展”:

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

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说晓喻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感动力。(“白话”919)

这一改变作为“表达对象”的“思想”的说法,与钱玄同的废除作为“表达工具”的汉语的主张,显然均出于“如何令表达更加有力”的同一美好愿望。

四、表达与“全盘性反传统”

从这一角度考查研究界有关“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的争论,就有了新的视野。我的问题是,五四知识者是“全盘性反传统”,还是“全盘性反表达”?

《新青年》第5卷第6号的通信栏发表了陈大齐给钱玄同的一封信。陈大齐在信中讲述了一个从日本文的笑话书上看来故事:有人请外科医生看眼病。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珠不干净,须挖出来洗一洗。病人答应了。医生便把病人的眼珠挖出来洗干净,晒在院子里,不料被一只老鸦衔去了。医生只好掉一枪花,挖一个狗眼球来替代。后来,外科医生问病人的情况。病人说,眼病是大好了,却有一件怪事:自从请你挖出来洗过之后,见了粪只觉得可爱,又香又甜。陈大齐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中国的情况,说中国大多数人的眼珠都被那个外科医生掉了枪花!钱玄同则在回信中说,“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唯一大目的”(陈大齐625-27)。

这里的“眼珠”的所指,便是人们赖以阅读、写作与思考的“知识/表达系统”。五四知识者对“传统的”表达系统的批判,多少可以称得上是“整体性”的。这一表达系统的物质形式便是汉字与汉语。对汉字与汉语“激烈批判”的代表人物是钱玄同。他认为,中国文字论字形,则不是拼音文字而属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读写;论字义,则意义含糊,语法不精密;论学术研究上的应用,则新的事物与新的道理的名词一无所有;论历史,则主要是儒道学说的记载。所以“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钱玄同,“中国”

354)。

而且,五四知识者,试图通过改变“文字、语言”等表达工具,达到整体性变革旧的“表达系统”的目的。吴稚晖曾经描绘了一个如此美好的蓝图:

仿佛从前我们是踱方步的前进;他人始而是垂了牛车前进,继而是快马前进,现在是汽车前进。[……]假如取了法文算第二国文;再把英德文作为大学及高等学校必修的辅课;把 Esperanto 作为高等小学及中学必修的辅课;仍将英德文作为中学可增的辅课。如此,庶几乎世界头等文明国的书报,如替中国做的;印刷厂,报社,如替中国开的;各种学校,如替中国立的。此如汽车以外,火车,飞机,帮着并进;庶几乎可以追到同等的地位。(505-06)

更重要的,也是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的是,他们“整体性”地解剖了这一表达系统的功能,亦即它与表达的制造者以及传播者的实际欲望与行为的关系。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曾引用《狂人日记》的以下段落,来证明鲁迅把中国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批判: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转引自林毓生425)

林氏因此以为“鲁迅把中国历史看作人吃人的记录”(199-200)。在事实上,他的这一论断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鲁迅借《狂人日记》要揭示的是“古家的簿子”、“历史”、“道理”等种种“表达”共通的历史功能——这一表达系统在语言的层面试图维护“仁义道德”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秩序,在元语言的深层却指向“吃人”的纯粹的兽性方面欲望和行为。狂人的觉醒,并非发现了“吃人”这一事实,而是惊醒于他们的表达的神话功能及其与“吃人”的关联——“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

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鲁迅 426)。

而且,五四知识者指出,这一表达功能一面离不开表达者的表达实践,一面又反过来规范着表达者自己的表达与身体行为,因而与国民的言行不一的虚伪性格相辅相成。陈独秀分中国文学(包括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为“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三大类,所谓“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这三个类别分别对应的正是传统的表达在“表达者的位置”、“表达方式”与“表达的接受者”三方面的历史特征。其共同之处则在于“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因此,陈认为,要革新政治,必须从改革表达入手,亦即“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文学”1-4)。

张护兰在给陈独秀的一次信中更为详尽地解剖了这一历史现象:

我国文学,病在虚饰。此于道德问题大有关系。我国人处世接物,每多出以诈伪。循至文学,亦落此弊,摹古人琢字句,只求外观琳琅。至内容之合理与否,素不过问。有时良心上欲作一二诚恳语,然格于习俗,仍不得不故意花言巧语。盖我国人言行不一致久矣。国人亦不以此为非,或更从而演绎之。教者务使言行不相一致而学者亦力求言行相歧。否则恐不能见容于社会。(23)^①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五四知识者全盘批判和解剖的“传统”的“表达”,是“见容于社会”的表达,是通过权力网络保存和传播的表达,是权力者的表达。五四知识者在一面整体性地批判这一类表达的同时,却做了整理和研究另一类表达——包括弱者的表达、不为权力网络所保存和传播的表达、无声无息不被人注意的表达、甚至不识字者的不被已有表达网络所污染的“反表达”/“非表达”——的工作。诸如胡适的研究墨子,鲁迅的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等。有鉴于此,王元化先生在《为“五四”精神一辩》中指出,“五四”没

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其主要是反儒家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对儒家以外的诸子以及中国的古代神话、小说、民间故事、歌谣等都采取了全面分析研究的态度(16)。

这正揭示了早期五四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他们一面致力于解剖、批判传统上为权力网络所保存和传播的各类表达,整理和研究为权力网络所排斥的其他表达样式;一面又醉心于探讨和实践令其自身的表达更有力量的途径,而对于因此而造成的力量/权力的聚集并无十分的警惕。

注释[Notes]

①本文的讨论集中于1917-1920年早期倡导新文学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三份刊物。最近的代表性论文有严家炎的《“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考辨》。这篇文章指出,“反对儒家三纲,革新伦理道德,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就是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发动文学革命”。见《文艺研究》3(2007):7。又如刘再复的意见:“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一直扮演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主将陈独秀,发表的宣言性文章是《文学革命论》,而第二主将胡适,发表的纲领性文章是《文学改良刍议》[……]因此,我们在对新文化运动批评时,回避不了新文学革命”。见《共鉴五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27。

②这篇文章事实上集中体现了康梁时代的政治革新派对“小说”作为一类特别表达的基本意见。

③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办《安徽俗话报》;1907年夏鲁迅在日本筹办《新生》;胡适1908年在上海编辑白话《竞业旬报》。

④胡适1921年在为纪念《时报》而写的《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如此描述日报的特征:“我以为日报因为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故最应该做先锋,故最适宜于做先锋。何以最适宜呢?因为日报能普及许多人,又可用‘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报的势力最难抵抗,最易发生效果”。见《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407。

⑤即:“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见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4:290。

⑥诸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在《新青年》3卷1号讨论《文学改良刍议》的通信等。

⑦林玉堂(林语堂):“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新青年》4.4:367。还有读者把“应用文的教授”当作新文学

的运用的全体与进行的手段。见俞慧殊：“新文学之运用”，《新青年》4. 3:262-63。

⑧钱玄同的说法最为典型：“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见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 4:354。

⑨张护兰：“致陈独秀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通信》第23页。刘半农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诸如此类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自有这种‘虚伪文学’，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出个不可收拾的‘虚伪社会’来。”见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3. 5: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蔡元培：“总序”，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Cai, Yuanpei. “General Introduction.”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Ed. Zhao Jiabi. Shanghai: Shanghai Liangyou Publishing Company, 1935.]

陈大齐：“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5. 6:625-27。

[Chen, Daqi. “Protecting Eyes and Recovering the Eyes of Human.” *New Youth* 5. 6: 625-27.]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1. 4:1。

[Chen, Duxiu. “An Introduction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Arts.” *Youth Magazine* 1. 4: 1.]

——：“通信”，《青年杂志》1. 4:2。

[- - - . “Correspondence.” *Youth Magazine* 1. 4:2.]

——：“通信”，《青年杂志》1. 6:1-2。

[- - - . “Correspondence.” *Youth Magazine* 1. 6:1-2.]

——：“通信”，《新青年》2. 6:12。

[- - - . “Correspondence.” *Youth Magazine* 2. 6: 12.]

——：“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 6:1-4。

[- - - . “On Revolution of Literature.” *Youth Magazine* 2. 6: 1-4.]

——：“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1(1904):6。

[- - - . “On Traditional Opera of China.” *Anhui Mandarin Newspaper* 11(1904): 6.]

——：“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1. 4:5。

[- - - . “Patriotism and Consciousness.” *Jiayin Magazine* 1. 4: 5.]

——：“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 2:1-4。

[- - - . “The Policy of Today’s Education.” *Youth Mag-*

azine 1. 2: 1-4.]

——：“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1(1904):3。

[- - - . “Reasons for Anhui Vernacular Newspaper.” *Anhui Mandarin Newspaper* 1 (1904): 3.]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5. 4:330。

[Fu, Sinian. “Aspects of Theatre Arts Reform.” *New Youth* 5. 4: 330.]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1. 2:346。

[- - - . “Long-rooted Problems of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The Renaissance* 1. 2: 346]

——：“再论戏剧改良”，《新青年》5. 4:360。

[- - - . “A Second Comment on Theatre Arts Reform.” *New Youth* 5. 4: 360.]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 5:919。

[- - - .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the Reform on Psychology.” *The Renaissance* 1. 5: 919.]

胡适：“本报之大纪念”，《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Hu, Shi. “A Review of This Newspaper.” *Complete Works of Hu Shi*. Vol. 21. Hefei: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新青年》4. 1:77。

[- - - . “On Fiction and Vernacular Rhymed Writing.” *New Youth* 4. 1: 77.]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 4: 301。

[- - - . “On Constructive New Literature.” *New Youth* 4. 4: 301.]

——：“导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 - - . “Introduction.”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Ed. Zhao Jiabi. Shanghai: Shanghai Liangyou Publishing Company, 1935.]

——：“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 6: 490。

[- - - . “On Ibsenism.” *New Youth* 4. 6: 490.]

黄远庸：“释言”，《甲寅杂志》1. 10:2。

[Huang, Yuanyong. “An Explication on Words.” *Jiayin Magazine* 1. 10: 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Liang, Qichao.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Yinbingshi Heji*. Vol.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Trans. Mu Shanpei.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 House, 1988.]
- 林语堂：“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新青年》4. 4：367。
- [Lin, Yutang. “A Study on the Index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estern Literature.” *New Youth* 4. 4: 367.]
- 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1981.]
-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 1:107-08。
- [Luo, Jialun. “Today's Chinese Fiction.” *The Renaissance* 1. 1: 107-08.]
-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3. 1:5。
- [Qian, Xuantong. “Correspondence.” *New Youth* 3. 1: 5.]
- ：“通信”，《新青年》3. 6:9-10。
- [- - - . “Correspondence.” *New Youth* 3. 6: 9-10.]
-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 4:354。
- [- - - . “On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n the Future.” *New Youth* 4. 4: 354.]
- 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1989 年。
- [Wang, Yuanhua. “A Defense for the May Fourth Spirits.” *The May Fourth: A Study from Varied Directions*. Eds. Lin Yusheng, et al. Hong Ko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H. K.), 1989.]
- 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新青年》5. 5:505-06。
- [Wu, Zhihui. “The Methods to Remedy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Youth* 5. 5: 505-06.]
- 余元浚：“读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3. 3:4。
- [Yu, Yuanjun. “Comments on Hu Shih's Study on Literature Reform.” *New Youth* 3. 3: 4.]
- 张护兰：“致陈独秀信”，《新青年》3. 3:23。
- [Zhang, Hulan. “A Letter to Chen Duxiu.” *New Youth* 3. 3: 23.]
- 曾毅：“通信”，《新青年》3. 2:6。
- [Zeng, Yi. “Correspondence.” *New Youth* 3. 2: 6.]
- 周作人：“思想革命”，《每周评论》11(1919):3。
- [Zhou, Zuoren.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Thoughts.” *Review Weekly* 11 (1919):3.]

(责任编辑:王 峰)